

文明与风土之间：青年博厄斯的两次学术“出走”

张力生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刚刚进入美国人类学界的弗朗兹·博厄斯曾有过十余年的博物馆工作经历。在此期间，他以植根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传统中的相对主义文化观，向当时美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界主流进化论阐释系统发起挑战。博厄斯通过实践表明，人类学博物馆的目的不在于重述等级性的文明秩序，而应尽可能地展示一地之风土与其文化间的互动与关联。青年博厄斯的博物馆实践，为推动美国新旧人类学的范式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博厄斯；博物馆人类学；文化进化论；文化相对论

DOI:10.13370/j.cnki.fs.2025.04.014

1886年7月10日，刚满28岁的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从柏林出发前往纽约。在此之前，他已数度往返于家乡与北美之间，经历了一段——如他在一封家书中诉说的那样——“心属两地”的迷茫岁月。^①

1881年获德国基尔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博厄斯转向地理学研究，于1883年前往巴芬岛(Baffinland)考察当地自然环境对因纽特人迁移的影响。1884年，他在结束田野调查后在美国博物馆求职未果，于1885年回到德国，前往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跟随德国体质人类学家鲁道夫·魏尔肖(Rudolf L. K. Virchow)和民族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一同工作。1886年，他凭借巴芬岛研究，获得柏林大学地理学“编外讲师”(privatdozent)资格。而正当博厄斯开始在德国地理学与民族学界崭露头角时，他决心放下一切，再次前往美国。也正是这次出走，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类学的走向。

博厄斯在美国的学术生涯并非一帆风顺。1887年，刚刚进入美国学术圈不久的博厄斯，便与美国国家博物馆民族学策展人奥蒂斯·梅森(Otis T. Mason)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博厄斯从自己所继承的德国民族学立场，对当时统治美国主流人类学界的摩尔根进化论提出了挑战。博厄斯反对梅森将民族学材料按人类向“文明”逐渐演进的等级序列形式进行展示，主张呈现不同个体文化生成的历史与风土。

这场论战可被视为20世纪美国现代人类学范式变革的发端。此后，博厄斯用了近二十年时间，让具体主义的文化观进入美国民族学陈列的主流。而在1905年，已逾不惑之年的博厄斯却再次“出走”，彻底离开美国博物馆界，赴哥伦比亚大学全职任教。此时，距令其真正蜚声学界的《原始人的心智》(1911)出版，还有6年。

可以说，这两次“出走”间的十余年，是青年博厄斯完成地理学、民族学的探索，形成其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键阶段，也是我们进入这位“美国人类学之父”^②思想世界的必由之路。

作者简介：张力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北京10087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多元文明传统与多元知识体系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4&ZD312)的阶段性成果。

^① Rosemary Lévy Zumwalt, *Franz Boas: The Emergence of the Anthropologist*. Lincoln & London: Nebraska Press, 2019, p. 132.

^② [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法]迪迪埃·埃里蓬：《亦近，亦远：列维-斯特劳斯谈话录》，汪沉沉译，海天出版社，2017年，第64页。

博厄斯学术人生的这段关键时期,是在博物馆中度过的。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到美国国家博物馆、费尔德哥伦比亚博物馆,再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博厄斯在其民族志田野与展示实践中,融贯德、美两种民族学传统,推动了美国现代人类学的范式转型,使美国人类学的目标从论证人类进步的“文明”,转向理解孕育文化之“风土”。本文尝试呈现自1887年至1905年间青年博厄斯的这段“博物馆时代”,力图在学术史语境中,厘清其理论根源与发展脉络,并进一步揭示其中所涉及的博物馆实践、人类学知识生产以及公共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与多重张力。

一、摩尔根进化论与19世纪美国人类学

1887年1月,博厄斯第一次参观美国国家博物馆。当时,他刚刚结束对西北海岸不列颠哥伦比亚土著印第安部落为期3个月的田野调查,因此前往位于华盛顿的国家博物馆参观有关西北海岸的藏品。然而,美国国家博物馆的民族学展览令博厄斯大失所望:所有同类型器物,无论工具、武器、服装还是仪式用品,不论出处,一律按照“蒙昧—野蛮—文明”这一进化论框架陈列。这与博厄斯在巴芬岛进行田野调查时,对因纽特人物质文化进行观察研究的感受大相径庭。

在北美西北海岸,博厄斯在土著文化中发现了广泛的多样性和惊人的相似性,各地风土所造就的生活方式与物质文化既有同,又有异。然而在美国国家博物馆的民族学陈列中,来自西北海岸的民族志材料分散在整个展览中,与虽来自不同地区和文化,却被认为处于同一“进化阶段”的同类器物并置比较。

文化进化论为何在19世纪末的美国人类学界中如此根深蒂固?这还要从美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建立谈起。与英、德不同,美国现代民族学的建立自一开始就是国家行为。可以说,人类学与民族学与现代美国相伴而生,这与美国作为前殖民地,在独立战争之后构建其全新的民族-国家身份,并寻求立国的道德合法性话语有着密切联系。与欧洲诸国的学术传统不同,美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首先要处理的问题,是这个新兴西方国家与其内部“他者”,即北美的印第安原住民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将这个问题形容为美国人类学学科“核心的、恼人的政治和宗教困境”：“这些人与我们在任何意义上是兄弟吗?我们又有什么权利宣称这片土地是我们的?”^①

1846年,美国第一个国家级科学机构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成立。其创始人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便将人类学纳入其中。1857年,亨利写道:“搜集一切有关北美原住民的历史、习惯、风俗、体貌特征——总之,一切能解释其品格与过去的东西——是这个国家对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神圣责任。”^②

自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到一战之前,是美国现代人类学的职业化阶段。1879年,美国民族学局(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成立,隶属于史密森学会。美国民族学局以研究为使命,其成立结束了学科此前依赖个人收入或私人赞助的状况,而是主要依靠政府的机构化支持。在民族学局的领导下,人类学实现了更大调查范围和允许有偿的全职研究,推动了学科的职业化进程。^③

① Curtis Hinsley, *The Smithsonian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Making a Moral Anthropology in Victorian America*. Washington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 29.

② Regna Darnell, *And Along Came Boas: Continuity and Revolution in Americanist Anthropology*.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8, p. 21.

③ Michael Ames, *Museums, the Public and Anthropology*. Vancouver, B. 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6; Whitfield J. Bell (ed.), *A Cabinet of Curiosities: Five Episodes in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Museum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67; Ivan Karp, Christine Mullen Kreamer & Stephen D. Levine,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The Politics of Public Culture*.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2.

民族学局的工作是在摩尔根进化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局长约翰·威斯利·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根据摩尔根提出的“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进化说,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步的过程。正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第一编所说:“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①应当指出,鲍威尔所信奉的摩尔根式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存在鲜明的差别,这个差别在于对“进步”如何发生的不同理解。对摩尔根和鲍威尔来说,人类进化的根本动力是“人性”(humanities),即人类能够创造语言、建立制度和运用理性来理解世界的能力。他们反对将人的进步与自然界的进化规律相类比,像达尔文和斯宾塞那样将社会文化进步归因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美国早期人类学家之所以反感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的残酷逻辑,与19世纪中后期“镀金时代”(Gilded Age, 1870—1900)美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密切相关。其间,数百万移民从欧洲来到美国,带来了重工业的飞速发展。与财富暴增并行的,是“镀金时代”美国的文化衰落。因此,纽约、波士顿等地的都市精英不断试图通过文化事业为日益多元和难以管理的城市重新确立“高尚”的道德引导。包括摩尔根在内的早期美国人类学家都认为知识生产活动应当具有高度的道德意涵,带有启迪民智、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因此,鲍威尔认为,社会进化不是通过个体间相互竞争实现的,而是一个以“人”为中心,其思想、行为和制度逐渐从低级到高级提升的过程。^②

因此,在鲍威尔看来,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以了解“人性”为目的和原则,应当关注的是社会的“超有机体”(superorganic)层面,即超越生物性个体的“文化”因素,及其对人类心智的形塑和影响。鲍威尔称,“通过对印第安人的习俗和器物的观察……可以了解土著人的思想建立一个恰当的尺度(index)。……这个原则奠定了民族科学的基调……承认这一原则,也能帮助我们通过对许多民族的观察中推断出的人类发展阶段的顺序,并对其进行解释”^③。

摩尔根进化论是鲍威尔民族学工作的“哲学”,《古代社会》更是被视为美国民族学的“圣经”,自然成为民族学局工作人员的必读书目。有学者回忆说,鲍威尔即便在进行田野考察时也将此书随身携带,秉烛夜读。^④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政府科学家之一,鲍威尔最重要的学术目标,便是将美洲印第安人置于整个人类文明的演化序列中。为此,关于民族学局的工作在科学事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尽管当时民族学局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印第安人研究,但仅仅依靠民族志调查是不够的,民族学应当成为建立一种“整体性人文科学”的手段,他认为这种科学便是“人类学”。^⑤因此,鲍威尔实际上对“民族学局”的名称颇有些遗憾。事实上,他的第一份年度报告已经提出了他对广义“人类学”的定义:“近年来,人类学作为一个术语被用来指整个人类科学——人作为动物,作为思想体,作为经济、艺术、制度、语言、文学、美术、宗教和观点的参与者。”^⑥换言之,鲍威尔的人类学是一种探究人“何以为人”,又“何以文明”的学问。

①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页。

② Regna Darnell, *And Along Came Boas: Continuity and Revolution in Americanist Anthropology*.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8, p. 88.

③ Regna Darnell, *And Along Came Boas: Continuity and Revolution in Americanist Anthropology*.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8, p. 88.

④ Carl Resek, *Lewis Henry Morgan: American Schol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p. 14.

⑤ 鲍威尔也是美国最早提出人类学分支构想的学者之一,曾提议将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心理学、美学、技术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哲学。

⑥ Regna Darnell, *And Along Came Boas: Continuity and Revolution in Americanist Anthropology*.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8. pp. 91-92.

在鲍威尔领导下的美国政府人类学一直贯彻摩尔根式的进化论观点。1881年成立的,同样隶属于史密森学会的美国国家博物馆自然也不例外。博物馆的民族学展陈采用摩尔根式的单线进化论叙事结构,首次展示了民族学局与史密森学会所收藏的大量自然历史标本与民族志材料。^①对于同类型的器物,不论来源出处,均被归入“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结构当中,目的是以这些器物为坐标,对其所代表的不同族群的“文明发展”阶段进行比较。这套类型学的展陈逻辑,是由国家博物馆策展人、民族学家奥蒂斯·梅森主持设计的。梅氏出身哥伦比亚大学,是鲍威尔的坚定同道者,他认为博物馆的作用在于通过展览对公众进行教育,展示进入“文明”阶段的民族在艺术和工业水平上远远优于“野蛮”民族。可见,在美国,人类学博物馆的实践重心就被放在藏品分类和展示方面,与依托于民族学局等研究机构的“专业人类学”形成了明确分工。

二、文明与风土间:博厄斯与梅森之辩

“我无法认同梅森教授民族学研究的主导原则。”1887年5月20日,博厄斯在发表于《科学》的《出现在相距甚远地区的类似的发明》(“The Occurrence of Similar Inventions in Areas Widely Apart”)一文中坦率地写道。他指出梅森式进化论陈列中存在根本的逻辑错误,在于武断地认为有“相同的因”就会得到“相同的果”:

在他列举的相似发明的原因当中,有一种可能性被忽略了,而这将推翻他的整个论证,那就是:不同的因产生相同的果。其实,相同的因产生相同的果的情况,只在极少情况下才能被证明,因为影响人类思维的因素是如此复杂;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完全未知的,试图找到类似的原因必须失败,或充其量是一个模糊的假设。相反,由于影响因的复杂性,不同的因产生相似的民族学现象,或许更加普遍。就发明而言,人类采取适当行动的倾向是唯一的普遍原因;但这是如此普遍,它不能成为发明系统的基础。^②

显然,梅森的类型学陈列方案展示的是处于不同文明发展阶段之“果”,而未解释不同文化现象各自的“因”。继而,博厄斯转向了展陈:

若将一样工具放在它周围的环境之外,放在它所属之人的其他发明之外,放在影响那个民族及其生产的其他现象之外,我们就不能理解它的意义。一组用于相同目的,或由相同的材料制成的工具只能教会我们一个事实,那便是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肯定也已经有人做出了类似的发明,而相反,将一个标本置于能反映一个部落的生活的一组藏品当中,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单个标本。我对梅森的反对意见可以表述为:分类并非解释。^③

两周之后,梅森在6月3日的《科学》上撰文回应了博厄斯。他首先为自己的展览方式辩护,指出所有博物馆策展人,或者任何其他需要处理民族志材料的人,都必须根据某种原则进行分类。而选择什么样的分类原则,取决于展览的目的和藏品的局限性。^④然后,他对博厄斯关于“同因不同果”的批评作了针锋相对的回应:

有关在相距甚远的地区出现相似发明的问题,我认为博厄斯博士提出的“不同因能产生相似现象结果”的论述非常巧妙,但这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无关。若一定要说有关系的话,那便是在

① 收藏标本的主要负责人是博物学家斯宾塞·拜尔德(Spencer Baird),他自1848年开始为史密森学会搜集收藏品,并于1878年接替约瑟夫·亨利,成为该学会第二任会长。美国国家博物馆就是建立在他的收藏基础之上。

② Franz Boas, “The Occurrence of Similar Inventions in Areas Widely Apart,” *Science*, vol. 9, no. 224 (May, 1887), p. 485.

③ Franz Boas, “The Occurrence of Similar Inventions in Areas Widely Apart,” *Science*, vol. 9, no. 224 (May, 1887), p. 485.

④ Otis Mason, “The Occurrence of Similar Inventions in Areas Widely Apart,” *Science*, vol. 9, no. 226 (Jun., 1887), p. 534.

“相同的果来自相同的因”这一公理面前,他关于“相似的果来自不同的因”的断言很难被接受。^①

可见,梅森认为,人类不同文化的共同“动因”早已被揭示,即由简单向复杂、野蛮向文明不断演进,并以此作为他民族学陈列实践的前提。他强调:

无论器物还是习俗,一定都是基于既有的发明所创造出来的,正如只有生命可以创造生命一样,我们越早认识到,在对艺术、制度、语言、知识、习俗、宗教和种族的研究当中,我们都必须运用生物学家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我们的科学就能够越早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②

6月17日,博厄斯以《民族学博物馆及其分类》(“Museums of Ethnology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为题,对梅森做了更完整的回应。他首先陈述了自己对于民族学的理解:

我们科学的目的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所谓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现象,包括它们的历史发展和地理分布,以及它们的生理形态和心理基础。……前者的目的是从现象中推导出规律,后者的目的是描述和解释现象。我试图证明这两个分支具有同等的科学价值。^③

这里,他又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释:

民族学现象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结果,也是在环境影响下发展的结果;因此,为了获得科学结果,必须研究两个问题。初步研究是针对周围环境,最终目的是了解人类生理和心理特征发展的规律和历史……处理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比较法——这也是梅森教授的方法——通过比较现象,再进行类比得出结论。另一种方法是研究所有部落中由共同心理原因引起的现象,以及受其周围环境影响的现象;即通过追踪单一现象的全部历史。这就是归纳法。根据这种研究方法,只能依据部落对博物馆标本进行分类,因为只有那样才能够反映自然和环境。^④

若要充分理解博厄斯与梅森的分歧,还需进一步探究博厄斯民族学的思想来源。事实上,博厄斯在结束巴芬岛考察之后,就曾分别在纽约和华盛顿拜会过鲍威尔和梅森,尽管没能获得工作机会。1885年3月他回到德国之后,不久便开始跟随柏林民族学博物馆馆长阿道夫·巴斯蒂安工作。^⑤

以巴斯蒂安为代表的早期德国民族学,植根于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传统中的“文化”观。这种文化(Kultur),与英法启蒙传统中进步的“文明”观念相对应,是一种“对生活面貌不加等级性、时代性比较”的概念。^⑥与启蒙的进化论者不同,德国民族学家不认为“先进的文明”为欧洲人所独有,相反,“落后”的土著人同样有自己的“文化”。巴斯蒂安民族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启蒙运动的最重要批判者之一,德国思想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针对伏尔泰的历史哲学,赫尔德于177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人类教育的另一种历史哲学》(“Auch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的论辩文章。赫尔德拒绝接受任何推动文明统一发展的存在理由,认为这是一种“武断的机制”,而是主张关注不同文化所发展出的价值当中的独特性。因此,赫尔德反对将任何特定的民族或时代与启蒙运动或其他外部标准进行比较,认为每个人类群体只能被理解为其特定历史的产物。^⑦赫尔德反对将理性看成人类的最高特质,是因为这种“理性-普遍性”

① Otis Mason, “The Occurrence of Similar Inventions in Areas Widely Apart,” *Science*, vol. 9, no. 226 (Jun., 1887), p. 534.

② Otis Mason, “The Occurrence of Similar Inventions in Areas Widely Apart,” *Science*, vol. 9, no. 226 (Jun., 1887), p. 534.

③ Franz Boas, “Museums of Ethnology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 *Science*, vol. 9, no. 228 (Jun., 1887), p. 588.

④ Franz Boas, “Museums of Ethnology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 *Science*, vol. 9, no. 228 (Jun., 1887), p. 588.

⑤ Rosemary Lévy Zumwalt, *Franz Boas: The Emergence of the Anthropologist*. Lincoln & London: Nebraska Press, 2019, p. 155

⑥ 王铭铭:《从经典到教条:理解摩尔根〈古代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39页。

⑦ Matti Bunzl, “Franz Boas and the Humboldtian Tradition: From Volksgeist and Nationalcharakter to an Anthropological Concept of Culture,” in George W. Stocking, Jr. (ed.), *Volksgeist as Method and Ethic: Essays on Boasian Ethnography and the German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p. 20.

压倒了每个民族的特殊性。在赫尔德看来,启蒙运动所主张的理性,只是空洞笼统的秩序。赫尔德赞同历史进步的观点,但他并不认为进步是以普遍性的程度来衡量的,对他来说,历史的进步是民族精神(Volksgeist),即每个民族独特的、不可取代的核心的展现和强化:进步不是线性和一元的,而是差异和多元的;也因此,赫尔德认为历史哲学的研究不是从普遍公理去推演和判定人类的活动,而是要以感性和直观进入不同民族的生活世界。

巴斯蒂安对于赫尔德关于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继承,集中地体现在对于“民族观念”(volkergedanken)的探究上。巴斯蒂安认为,“民族学的主要目标是对‘民族观念’保藏和收集”^①。巴斯蒂安同样试图通过搜集和分析不同的思想系统,然而与赫尔德不同的是,赫尔德从历史文献当中获得材料进行历时性的阐释,而巴斯蒂安则通过探险和旅行,对不同文化进行共时性的分析。这里,巴斯蒂安受到德国博物学家、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世界主义”传统的影响,渴望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中寻求全球性的解释,并认为只有对人类的多样性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找到“人类”最基本要素,并以此来探索其本质。因此,巴斯蒂安致力于建立作为“人类图书馆”的民族志博物馆,将人类历史的经验痕迹汇集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②

因此,巴斯蒂安式民族志博物馆的功能便是对大规模实证调查的成果进行整理和收纳,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关于人性的基本要素。这与19世纪80年代英美民族志博物馆的进化论框架正好相反:进化论是阐释的,物质文化是为了佐证阐明支配人类进步的自然法则。而在巴斯蒂安的博物馆中,物质文化材料是基础,旨在帮助民族学家归纳出能够解释人类多样性经验事实背后的一致性法则。因此,巴斯蒂安式民族学的根本逻辑是通过穷尽不同的文化现象,以识别所有人类共有的普遍特征。正因如此,巴斯蒂安对洪堡的另一位崇拜者达尔文的学说,持怀疑的态度。巴斯蒂安虽然钦佩达尔文的旅行,但与进化论的演绎逻辑针锋相对,认为后者缺乏事实证据的支持,达尔文主义者关于“人类进化谱系”的假设无异于“白日做梦”。^③

青年博厄斯的民族学观,显然受到巴斯蒂安的深刻影响,他进一步坚定了对总体性法则的归纳必须建立在对具体事实或个案的充分把握之上——包括自然环境、组织心理、地理迁移以及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换言之,每种文化,都可视作其所生长的环境与历史的结果,知“风土”,方能解“人情”。

梅森与博厄斯之辩,实际上是两种民族学研究路径的交锋:前者代表了自19世纪末美国式进化论的文明观,后者则是源自德奥民族学传统的某种具体论风土学,而这个区分正是博厄斯于1887年初发表在《科学》上的第一篇文章《论地理学研究》(“The Study of Geography”)^④当中试图讨论的问题。博厄斯对比了两种科学:自然科学(physical science)与历史科学(historical science),正对应于以上两种路径。对于前者,“科学的目的是从现象中推导出规律”,而“单一的现象本身”是无关紧要的,只是作为“规律的例证”,作为“发现新规律或确证旧规律”的手段。相比之下,历史科学的目标则是

① Klaus-Peter Koepping, “Enlightenment and Romanticism in the Work of Adolf Bastian: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Anthrop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Han F. Vermeulen and Arturo Alvarez Roldán (eds.), *Fieldwork and Footnote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84.

② Glenn Penny, “Bastian’s Museum: On the Limits of Empiric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rman Ethnology,” in H. Glenn Penny and Matti Bunzl (eds.), *Worldly Provincialism: German Anthropology in the Age of Empi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pp. 86-126.

③ Adolf Bastian,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vol. 3 (1871), p. 138.

④ Franz Boas, “The Study of Geography,” *Science*, vol. 9, no. 210 (Feb., 1887), pp. 137-141.

“对现象本身的调查”，并且不认为“现象受制于某些严格的法则”。具体来说：

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者比较一系列相似的事实，从中总结出所有这些事实所共有的普遍现象。从今以后，单一的事实对他来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只强调一般规律。另一方面，采用“历史科学”方法的研究者，关心的就只有事实。^①

博厄斯认为，这两种路径起源于人类心灵的两种不同“欲望”及其“审美需要”。自然科学试图“系统地”安排世界的无数现象，以便“对混乱的现象赋予秩序”。相比之下，历史科学则是从一种“情感”冲动中发展出来的，“一个事件的发生”引发了研究其“真实历史”的欲望。^②

博厄斯继续将这两种路径的分歧，追溯到启蒙时代的不同思想脉络中，将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主义与洪堡的“宇宙志”(cosmography)加以比较：

我们认为，自然科学的理念在孔德的科学系统当中体现的最为清晰。撇开天文学不谈，天文学被武断地置于数学和物理之间，他的所有科学都有一个目标，即从现象中推导出规律。单一的现象本身是无关紧要的：其价值，仅在于能够验证既有法则或有助于发现新的法则。而洪堡的“宇宙”观则反对这一科学体系。宇宙志，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认为每一种现象都值得研究。仅仅是它的存在就使它有权得到我们全部的关注；关于它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存在和演变的知识就足以让研究者满足，而无需考虑它所确证的或可能从中推导出的规律。^③

基于此，博厄斯也在对梅森的回应里，提出了自己理想的民族学博物馆展览，即应当将民族志展品按照不同部落进行分类，尽可能地还原器物在部落真实生活场景的状态。

“在民族学中，个性就是一切”，博厄斯写道，“我认为，民族学收藏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传播这样一个事实，即文明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正如一个拨浪鼓可能会制造音乐，可以驱走邪恶的靈魂，而另一个可能会分散哭闹的孩子的注意力。这完全取决于你在世界的哪个地方，而不是你碰巧在社会进化的某个线性路径上”^④。

仅一周之后，《科学》刊发了约翰·鲍威尔对博厄斯的回应。鲍威尔首先表明了自己对于博物馆功能的立场：

博物馆的功能是双重的：第一，作为研究者的资料库；第二，作为与收集的主题相关的一些知识系统的客观范例，供教师、学生以及其他参观者使用。^⑤

在这一点上，双方并无太大分歧。而对于跨地域的相似现象，鲍威尔认为与当下的博物馆讨论无关。而对于博厄斯关于按照部落进行展示的提议，鲍威尔认为在实际操作层面根本不可能实现。原因是北美的原住民部落数量超过两万五千种，且群落形态一直处于不断迁徙流变之中。若由博物馆去搜集这些部落的材料，则与“在同一天内对美国境内全部原住民做人口普查”无异，即便实现，“也没有科学价值”。^⑥而关于博厄斯引述的巴斯蒂安的地理分区方案，鲍威尔认为是“可能的”，但会极其昂贵且收效甚微。^⑦

鲍威尔的发声宣告了这场论争的结束。作为《科学》杂志临时编辑，年仅29岁的博厄斯对此只

① Franz Boas, "The Study of Geography," *Science*, vol. 9, no. 210 (Feb., 1887), p. 138.

② Franz Boas, "The Study of Geography," *Science*, vol. 9, no. 210 (Feb., 1887), p. 139.

③ Franz Boas, "The Study of Geography," *Science*, vol. 9, no. 210 (Feb., 1887), p. 138.

④ Franz Boas, "Museums of Ethnology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 *Science*, vol. 9, no. 228 (Jun., 1887), p. 589.

⑤ John Wesley Powell, "Museums of Ethnology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 *Science*, vol. 9, no. 229 (Jun., 1887), p. 612.

⑥ John Wesley Powell, "Museums of Ethnology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 *Science*, vol. 9, no. 229 (Jun., 1887), p. 612.

⑦ John Wesley Powell, "Museums of Ethnology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 *Science*, vol. 9, no. 229 (Jun., 1887), p. 613.

做了简短的回应,开宗明义地表示自己与鲍威尔上校“在许多根本问题上看法完全一致”^①。他也随即致信与梅森修好,称两人只是对历史的看法“略有不同”^②。

关于这场论证,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诚然,初出茅庐的博厄斯与位高权重的梅森、鲍威尔身份悬殊。有学者将博厄斯的挑战解读为毛遂自荐,为自己在美国学界打响名声。^③也有学者认为,博厄斯对梅森的批评背后透露出一种欧陆学者对美国科学界的傲慢态度,自认为可以通过一套德国方法论和认识论来迅速确立自己在美国人类学中的地位。^④但在总体上,学术史关于这场论证的叙事将博厄斯描绘得相对弱势。^⑤事实上,针对鲍氏关于部落分类的批评,博厄斯在最后一次回应中还是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尽管只有寥寥数语,但态度坚定且直中要害:

容我就鲍威尔少校关于部落分类和部落博物馆的不可行性再做一两句补充。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被不少博物馆解决了,有些甚至规模比国家博物馆大很多。这些博物馆的理想是对某个种族群体进行完整地展现,并通过小规模陈列展示不同文化的细微特征。事实证明,这可以通过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料来实现,而不会因重复而使资料负担过重,也不会进行人为的分类——只需根据种族相似性对部落进行分组。正如鲍威尔少校在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中所推断的那样,这种分组根本就不是为了分类的。由鲍威尔少校倡导并由梅森教授实施的展览计划,与上述这些博物馆计划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展示个体现象,而前者进行分类,并且这种分类并非是基于现象本身,而是基于策展人的理念。^⑥

1887年,博厄斯没能说服华盛顿的任何人。就在其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梅森主持重组了国家博物馆的民族学展厅,改为依照文化区域进行划分。^⑦鲍威尔也同意资助博厄斯对西北海岸的撒利希人(Salish)独立开展长期民族志研究。^⑧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大多数美国政府组织人类学展览时都采用立体布景来还原藏品的原生环境。尽管这些改变大多是形式的改良,并没有彻底替代进化论的总体框架,但足以反映两种不同的民族学路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结合。^⑨

① Franz Boas, “Reply to Powell,” *Science*, vol. 9, no. 229 (Jun., 1887), p. 614.

② Regna Darnell, *And Along Came Boas: Continuity and Revolution in Americanist Anthropology*.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8, pp. 91-92.

③ Ira Jacknis, “Franz Boas and Exhibits: 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Museum Method of Anthropology,” in George W. Stocking, Jr. (ed.), *Objects and Others: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p. 75-111; Curtis Hinsley, *Savages and Scientists: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1846-1910*. Washington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1, pp. 98-100.

④ Ira Jacknis, “The Ethnographic Object and the Object of Ethnology in the Early Career of Franz Boas,” in George W. Stocking, Jr. (ed.), *Volksgeist as Method and Ethic: Essays on Boasian Ethnography and the German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p. 187.

⑤ John Buettner-Janusch, “Boas and Mason: Particularism versus Generaliz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59, no. 2 (Apr., 1957), pp. 318-324.

⑥ Franz Boas, “Reply to Powell,” *Science*, vol. 9, no. 229 (Jun., 1887), p. 613.

⑦ Ira Jacknis, “The Ethnographic Object and the Object of Ethnology in the Early Career of Franz Boas,” in George W. Stocking, Jr. (ed.), *Volksgeist as Method and Ethic: Essays on Boasian Ethnography and the German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p. 192.

⑧ Regna Darnell, *And Along Came Boas: Continuity and Revolution in Americanist Anthropology*.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8, p. 124.

⑨ Noémie Étienne, *The Art of the Anthropological Diorama: Franz Boas, Arthur C. Parker, and Constructing Authenticity*. Berlin: De Gruyter, 2021, p. 28.

三、展示“风土”：从芝加哥博览会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1889—1892年,博厄斯在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892年辞职之后,受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馆长弗雷德里克·沃德·普特南(Frederic Ward Putnam)之邀,参与1893年芝加哥世界哥伦布博览会(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人类学展览的筹备工作。普特南对这届博览会格外踌躇满志,因为他计划将博览会中的人类学陈列以博物馆的形式永久保存下来。1890年5月,普特南在给《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一封公开信中首次公开宣布了在芝加哥建馆的意图:“我自一开始便有这个计划,并且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推进它。我一直坚持,芝加哥必须要拥有一座伟大的人类学博物馆,作为这次博览会的纪念。”^①为此,普特南成立了由他领导的民族学部,又称“M部”(Department M),聘请博厄斯做他的助手,以筹备相当规模的田野调查。

在克拉克大学任教的几年,博厄斯每年夏天都有机会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考察,积累了大量民族志材料。这让博厄斯有机会实践自己的民族学研究,在体质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领域都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方法。而这届博览会,正好给了博厄斯一次以展览的方式展示研究成果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展览由普特南新成立博览会人类学部和美国国家博物馆联合策展,因此展览体现出“文明”与“风土”这两条民族学展示路径的进一步融合。在主展馆,展览的总体叙事是进化论的,从考古遗存,到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化、实践、信仰,再到当时的先进文明成就,包括卫生、医疗、慈善等。然而,对于世界文化的展示是依照文化地理学组织的。梅森对展览的贡献是依据鲍威尔的北美语言地图安排了民族学展览,将这幅长16英尺、宽12英尺的语言地图安装在展览的中心,并且专门制作了实物大小的模型,在立体布景中展示每个语言所代表区域的“典型居民”。^②

除了传统民族学和语言学陈列之外,博厄斯还专门用8个展厅来展示体质人体学研究,主要包括三部分:美国印第安人身体特征的展示;关于儿童成长发育的展示;还有一个工作实验室,可以让观众实时进行心理学、神经学和颅相学测量和实验。此外,博厄斯还邀请了17位夸扣特尔印第安原住民,在人类学楼的不远处搭建长屋,并立起6根图腾柱,在其中进行“居留展演”,以让观众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舞蹈和仪式。

这样的安排在当时并不鲜见。博厄斯在博物馆生涯之初,就有过安排原住民真人展示的经历。1885—1886年,博厄斯受雇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期间,就与9名贝拉库拉印第安人(Bella Coola Indians)一起工作过,他们作为“民族风情秀”(Völkerschauen)演员被带到了柏林。1886年,博厄斯还曾在《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上发表《雅各布森上尉的贝拉库拉印第安人》(“Captain Jacobsen's Bella Coola Indians”)一文,提出了一个关于展示外国人的伦理问题:

长期以来,将外国部落的代表带到欧洲是一种时尚,目的是尽可能向我们展示他们的生活和习俗。当一个信仰人道主义的人,看到可怜的澳大利亚人或精力充沛的爱斯基摩人在外国气候的影响下日渐消瘦时,或当一些人被凝视时,更多的是惊叹于他们惊人的身体,而不是因为他们的风俗习惯,他很可能会反思这种展览的可接受性。^③

尽管博厄斯必定倾注了自己的思考和改良,但在芝加哥博览会的居留展演并未引起太多的关

① Curtis M. Hinsley and David R. Wilcox (eds.), *Coming of Age in Chicago: The 1893 World's Fair and the Coalescence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6.

② Rosemary Lévy Zumwalt, *Franz Boas: The Emergence of the Anthropologist*. Lincoln & London: Nebraska Press, 2019, p. 212.

③ Rosemary Lévy Zumwalt, *Franz Boas: The Emergence of the Anthropologist*. Lincoln & London: Nebraska Press, 2019, p. 155.

注。有学者说,印第安人的有些行为甚至令前来参观的游客感到震惊。当夸扣特尔人在进行“食人舞”仪式中模拟放血时,一名观众尖叫着打断了表演。^①

总的来说,这届芝加哥博览会的人类学展览算不上成功,博览会负责人甚至在整个会期都没有光临人类学展区。但这届芝加哥博览会为博厄斯提供了一个实践其展览理念的机会,根据他几年前在与梅森和鲍威尔的辩论中提出的原则,帮助设计一个博物馆空间——向公众展示不同印第安部落的风土人情和最新的实地研究,而非先入为主的文明叙事。^②

1894年,费尔德哥伦比亚博物馆(Field Columbian Museum)按照计划正式建立,整体定位为自然历史博物馆,但其中普特南创立的民族学部顺利保留了下来。然而好景不长,博物馆的馆长斯基弗(F. J. Skiff)并非学者出身,对普特南与博厄斯苦心经营的人类学部依然提不起兴趣。这届博览会之后,两人依照约定,在博物馆短暂任职——博厄斯任民族学部主任,普特南为顾问——结果很快因为博物馆管理层的缺乏重视加之种种行政干涉不欢而散。博物馆甚至不允许两人整理自己所搜集的民族志材料。博厄斯在离职时给馆长斯基弗留下的“待办列表”中,甚至有“必须立即对藏品进行杀虫”一项。^③

离开芝加哥的普特南,于同年赴纽约出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考古学与人类学部的策展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于1869年成立,1889年设考古学与民族学部。1895年,博厄斯追随普特南前往纽约,加入博物馆任助理策展人,并于次年获聘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讲师。自此,他终于在美国学界拥有了稳定的机构身份。

博厄斯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总共工作了10年,其间成绩斐然。作为助理策展人,他在博物馆馆长莫里斯·杰瑟普(Morris Jesup)的资助下,连续五年前往北美洲与亚洲大陆原住民部落进行田野考察。这场“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是人类学历史上最早的系统田野考察之一,采集了丰富的物质文化标本以及语言学与民族志材料。但也正是在这次远征考察中,博厄斯与博物馆的理念分歧逐渐显现:博厄斯作为人类学家,将考察的重点放在民族志记录和田野工作上;而博物馆则一直敦促博厄斯,不要偏离考察的“实际”目的,即为展览搜集文物。

博厄斯很快卷入了与博物馆管理部门关于人类学部的工作和目的的争论。这样的分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十分常见。纽约的慈善家建立博物馆的初衷是为提升公共教育,丰富文化生活,而并非推动科学研究。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就曾明确对博厄斯表示:

博物馆的实地考察不得以科学为目的,而只能是为了填补展览中的空白。……如果考察过程中有意外的科学发现,是可以接受的。但绝不能以此作为田野工作的目的。^④

对此,博厄斯针锋相对:

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不是以收藏为主要目的;我们的目标,是对所在的地区进行全面彻底的考察。我们搜集标本,并不是为了能制作一个漂亮的展览,而是为了尽可能完成全面的民族

① Charles King, *Gods in the Upper Air: How a Circle of Renegade Anthropologists Reinvented Race, Sex, and Gend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Doubleday, 2019, p. 183.

② Curtis M. Hinsley and David R. Wilcox (eds.), *Coming of Age in Chicago: The 1893 World's Fair and the Coalescence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6.

③ Regna Darnell, *And Along Came Boas: Continuity and Revolution in Americanist Anthropology*.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8, p. 137.

④ Ira Jacknis, "Franz Boas and Exhibits: 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Museum Method of Anthropology," in George W. Stocking, Jr. (ed.), *Objects and Others: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 89.

学和考古学研究工作。^①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博厄斯不关心展览,也不关心公众。博厄斯在1907年发表的《博物馆管理的诸原则》当中,提出了博物馆的三大功能:“消遣”(entertainment)、“教育”(instruction)、“研究”(research)。^②博厄斯认为,超过90%的观众对博物馆的要求仅限于消遣:

那些[在博物馆中]寻求休闲和消遣的观众,会对系统的教育十分反感,因为他们希望得到的是情感上的刺激和震撼,去为奇珍异宝所倾倒,赞叹。因此,如果展览的呈现足够清晰,不消花费太多精力就能使观众得到展览想要传达的真理。^③

关于教育功能,博厄斯认为最好通过小型、专业性博物馆,以及学校博物馆来实现。他承认,如美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约翰·古德(John Goode)曾说,出于公共教育的目的,博物馆就是“由标本做注脚的一系列说明牌”^④。在19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博厄斯也曾向杰瑟普提议了几项面向公众和学生的展览策划,其中甚至出现了梅森式的进化论叙事特点。例如,博厄斯曾设想通过一个展览来展示“原始部落如何完全依靠他生活当地的物产,并解释文明的进步如何能让人享受到更多地方物产的滋养”^⑤。

对于像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样的综合性大馆来说,博厄斯坚持其首要功能还是为科学研究服务。因此,他认为一个大馆不可能按照一套单一的框架——如进化论——来进行展陈,尽管那样更容易为普通观众所接受,却可能要以牺牲科学的准确性和严谨性为代价。^⑥相反,博厄斯认为大馆应当完全忠实于材料的信息,并保持研究专业度,即便这将让大多数参观者望而却步。

杰瑟普十分重视博物馆的公共职能,但针对博物馆公共性的理解,他与博厄斯背道而驰。杰瑟普认为,公众教育意味着简单明了,“如果能让儿童都感兴趣的展览,也一定会引起成年人的兴趣”^⑦。而博厄斯认为:

科学的大众化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即从事某项工作则必须受到专业训练已是一种过时的偏见。如今,良好的常识加上一知半解的知识似乎对任何行业的人都足够了,无论是商业,科学还是公共事务。而我所理解的科学的公共化,恰恰是为避免这种倾向的努力,为的是向公众传达真理的崇高和获得真理所需的真诚努力。^⑧

因此,博厄斯与自然历史博物馆管理层的根本分歧还在于博物馆的研究功能。随着双方矛盾愈演愈烈,北太平洋的田野考察也因此终止,博厄斯对博物馆越发失望。最终,他于1905年辞职,将材料带往哥大人人类学系继续整理发表。两年后,博厄斯发表《博物馆管理的诸原则》一文,表达了自己对人类学展览的结论式的观点:

任何试图通过对标本进行系统分类来呈现民族志材料的行为,将不仅是主观的,并且会带

① Ira Jacknis, “Franz Boas and Exhibits: 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Museum Method of Anthropology,” in George W. Stocking, Jr. (ed.), *Objects and Others: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 89.

② Franz Boas, “Some Principles of Museum Administration,” *Science*, vol. 25, no. 650 (Jun., 1907), p. 921.

③ Franz Boas, “Some Principles of Museum Administration,” *Science*, vol. 25, no. 650 (Jun., 1907), p. 922.

④ Franz Boas, “Some Principles of Museum Administration,” *Science*, vol. 25, no. 650 (Jun., 1907), p. 923.

⑤ Ira Jacknis, “Franz Boas and Exhibits: 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Museum Method of Anthropology,” in George W. Stocking, Jr. (ed.), *Objects and Others: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 87.

⑥ Franz Boas, “Some Principles of Museum Administration,” *Science*, vol. 25, no. 650 (Jun., 1907), p. 921.

⑦ Regna Darnell,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1879-1920: From 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of Franz Boa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69, p. 143.

⑧ Franz Boas, “Some Principles of Museum Administration,” *Science*, vol. 25, no. 650 (Jun., 1907), p. 923.

有误导性。文化的心理关系和历史关系是人类学研究的唯一对象,而这两者是无法通过任何由少量的标本所反映的民族生活来进行表达的。……这些标本本身只是“复杂的[文化]心理过程的偶然表现。而复杂心理过程本身才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博物馆]仅仅是一种汇集和妥善保存大量材料的手段,这些材料将在未来构成科学归纳的基础”。^①

博厄斯的第二次学术“出走”,不仅反映了人类学与博物馆之间在实践层面的深刻分歧,也预示了美国人类学学科研究范式的新旧更迭。如博厄斯的经历所示,进入20世纪,传统博物馆人类学在科学研究与公共教育关系上的矛盾凸显,囿于博物馆中的人类学家越来越难以实现其学术抱负,美国人类学的机构重心开始由博物馆转移到学院。同时,学院人类学在这个时期迅速发展,相关学科、专业建制化逐渐完善。博厄斯在1902年开始领导哥大人类学系,同年美国人类学学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正式成立,博厄斯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于1907年和1908年出任学会主席。^②成立于1883年的美国民俗学会(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也一直深受博厄斯民族学与人类学方法论的影响,是博厄斯派人类学家的重要阵地。博厄斯本人也曾在1900年担任美国民俗学会主席。^③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过程变得不可逆转,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像博厄斯一样选择进入大学。

四、博厄斯的博物馆遗产

“纽约有个幻境般的地方”,1943年,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曾这样描绘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童年的梦想在此相约聚会,百年古木吟唱发生,不知名的物体神情焦虑地凝望着来访者,比人类还善良的动物像人似的捧起小前爪,央求恩准给中选的海狸营造宫殿,带领它前往海狮的王国。然后用神秘的一吻教会它蛙禽的语言。^④

当时旅居纽约的列维-斯特劳斯曾无数次在这间由博厄斯设计陈列的西北海岸展厅中流连。而就在前一年冬月,这位年迈的大师在34岁的人类学新秀面前撒手人寰。人类学的历史似乎又在这充满象征意义的一幕中完成了交接。

西北海岸民族志展厅陈列的是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的直接成果。该展厅首先按照地理区位划分,相邻的展厅被尽可能安排展示相邻地区的文物。每个地理区域又分为两部分:介绍该地区主要风土与族群的“概要陈列”(synoptic collections);以及若干展示各个不同部落的文化“独立陈列”(individual collections)。概要陈列,按照“文化元素”来划分,包含:器用、家具、服装、贸易、渔猎、旅行、武器、装饰艺术、氏族组织等。独立的部落陈列,依次按地理区位自北向南排列:特林吉特(Tlingit)、琴仙(Tsimshian)、海达(Haida)、贝拉库拉(Bella Coola)、夸基乌特尔(Kwakiutl)、努特卡(Nootka)和撒利希。最后是地理上相邻但文化上不同的内陆高原部落的陈列。博厄斯希望以此表明,文明传播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是有限的,还需要结合每个民族当地历史和环境的影响进行考量。而每一个部落陈列当中,也基本按照概括性陈列当中的文化元素的顺序来进行安排。

① Franz Boas, "Some Principles of Museum Administration," *Science*, vol. 25, no. 650 (Jun., 1907), pp. 928-929.

② Regna Darnell, *And Along Came Boas: Continuity and Revolution in Americanist Anthropology*.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8, pp. 249-252.

③ Regna Darnell, *And Along Came Boas: Continuity and Revolution in Americanist Anthropology*.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8, pp. 255-256.

④ [法]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通过概要陈列与独立陈列的区分,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和需求的观众对于展览的期待。先由概要陈列呈现一个区域的总体形态,再由独立陈列带领观众进入民族志材料的细部,探索更具体的问题。除地理分区、双重陈列外,博厄斯还大量使用“实景还原”(Life Group),用蜡像、纸扎和石膏来塑造人物形象以及环境背景,以展示部落生活的真实场景。通常,每一组展示一个家庭或同一部落的几个成员,从事一些典型的劳动或艺术活动,以展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技艺成就。博厄斯试图通过这些情景,反映出不同自然环境如何形塑不同部落的生活方式和物质文化。例如,在一组夸扣特尔人的场景中,“女人在制作雪松树皮垫子,摇晃着睡在雪松树皮里的婴儿,摇篮是通过系在她脚趾上的雪松树皮绳子移动的”^①。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西北海岸展厅无疑是博厄斯最大限度实践其人类学理念的展览作品,也是他留给人类学最珍贵的博物馆遗产。

1940年,暮年的博厄斯回顾半个世纪之前自己抵达美国之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论地理学研究》,称其中已经阐明了其“后期作品当中的基本观点”^②。从这篇1887年的《论地理学研究》到1907年的《博物馆管理的诸原则》,青年博厄斯在与一系列博物馆的分分合合之间,度过了在美国人类学界的最初20年。他以植根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传统中的相对主义文化观,向当时美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界主流进化论阐释系统发起挑战。博厄斯通过实践表明,人类学博物馆的目的不在于重述等级性的文明秩序,而应尽可能地展示一地之风土与其文化间的互动与关联。青年博厄斯的博物馆实践,为推动美国新旧人类学的范式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20世纪美国人类学在当时欧陆盛行的进化论与传播论之外,找到了第三条道路。

[责任编辑 林海聪]

① Franz Boas, *Hall 105: Ethnological Collections from the North Pacific Coast of America*. New York: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00, pp. 3-4.

② Franz Boas, *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 vi.

Restoring the World with Customs: Stone Quarrying and Society in the Region of

Dashiwo in Fangshan District, Beijing

JU Xi, ZHANG Qiaoni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escalating crises, “restoration” has emerged as a core concern across disciplines. However, most restoration proposals remain theoretical, with few empirical explorations rooted in everyday lif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tone-quarrying region of Dashiwo in Fangshan District, Beijing, proposing a restoration framework centered on “customary practices” as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Over its two-millennium history of quarrying, Dashiwo has been dominated by state power in resource extraction, resulting in severe and sustaine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while laborers and artisans were subjected to systemic exploitation. Yet, through long-term settlement, the quarrying site evolved not into a desolate wasteland but a habitable homeland. Drawing on field research, this paper traces Dashiwo’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d practical mechanisms of self-restoration: through agricultural cultivation, ancestral tomb maintenance, festival gatherings, and other practices, local communities gradually restored soil, temporality, and social bonds amid landscapes scarred by quarrying. In this process, stone — both a livelihood foundation and the axis of cosmic order — embodied a “flesh-and-blood” medium that sustained the fourfold unity of heaven, earth, humans, and deities. Dashiwo’s self-restoration demonstrates that when theoretical rationality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falter in addressing contemporary crises, reviving the concept of “customary practices” — prioritizing the natural world over human intervention and listening over documentation — opens pathways for sustainable restoration.

Key words: customs; restoration; dwelling; Beijing Dashiwo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Terroir: Two “Exoduses” in the Early Career of Franz Boas

ZHANG Lisheng

Towards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ranz Boas, who had just entered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community, worked for over ten years in museums. During this period, he challenged the evolutionary framework in mainstream American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at that time, with a view of cultural relativism rooted in the German ethnological tradition. Boas demonstrated through his museum practice that the purpose of an anthropological museum is not to restate a hierarchical order of civilization, but to showcase the interaction and connection between a culture and its surroundings. The museum practice in the early career of Boas lai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paradigm shift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

Key words: Franz Boas; Museum Anthropology; cultural evolutionism; cultural relativism

Cultural Contact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Heritage Spaces: A Dual Case Study of

Kashgar Old City and Qingzhou Ancient Town

XU Feng, DONG Yujie

Heritage spaces are important platforms for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tourists and heritage destinations, facilitating tourists’ cultural identity formation towards these heritage sites.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cultural contact and identity formation among tourists, local communities, and heritage destinations merit thorough examination. Using case studies of Kashgar Old City and Qingzhou Ancient Town,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authenticity and immersive experiences influence tourists’ cultural contact and identity formation during their visits. The findings highlight that authenticity and immersive experiences shape tourists’ percep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experience economy.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backgrounds between tourists and heritage destination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ir experiences and the specific mechanisms involved. In heterogeneous cultural contexts, cultural contact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ourists’ immersive experiences, whereas in homogeneous cultural contexts authenticity primarily shapes tourists’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in heritage spaces. Additionally, interactions between tourists and local communities effectively reduc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simultaneously promoting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trengthening local identity in heritage destination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clarifies the distinct roles of authenticity and immersive experiences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It also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host-guest interactions for sustainable heritage tourism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se insights offer valuable guidance for heritage space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planning.

Key words: heritage space; heritage tourism; cultural contact; cultural identity; the experience economy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Production of New Cultural

Spaces in Urban Areas: A Case Study of Xuanfu Xiang in Jinling

ZHANG Zhaolin

The production of new cultural spaces in urban areas is the result of joint efforts of multiple forces, which can not only meet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urban residents but also creat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New cultural spaces are an effective vehicle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integrate into the urbanizing lives